

人民日报学术文库

儒学道德论 王阳明心学之 道德主体性研究

陈媛媛◎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人民日报学术文库

儒学道德论 王阳明心学之 道德主体性研究

陈媛媛◎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儒学道德论：王阳明心学之道德主体性研究 / 陈媛媛著.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2

ISBN 978-7-5115-3632-7

I. ①儒… II. ①陈… III. ①王守仁 (1472 ~ 1528)

—心学—研究 IV. ①B24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9041 号

书 名：儒学道德论：王阳明心学之道德主体性研究

著 者：陈媛媛

出 版 人：董 伟

责任编辑：陈 红

封面设计：中联学林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010) 65369844

网 址：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270 千字

印 张：16

印 次：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5-3632-7

定 价：68.00 元

作者简介

陈媛媛 女，1985年5月生，河北正定人，九三学社社员。现为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站博士后。

本硕博期间主攻哲学，曾获全国经济管理院校工业技术学研究会（全国一级学会）优秀论文三等奖、湖南省委党校理论研讨会一等奖，2014年1月被南华大学聘为“湖湘地域文学文化生态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序

王阳明是宋明理学史上最有真性情和自由精神的哲学家。他倡导的复兴心学、重建心学的学术运动,其实质是一场以反对朱子学为旗帜的道学革新运动。这场学术革新,不仅于晚明思想解放及儒学内部的自我批判极有影响,而且对古典儒学向近现代新儒学转型同样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明代前期朱子学笼罩下的思想学术是相对沉寂的。直到明代中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弘治、正德之际,随着江南商品经济及手工业、矿业的发展具有近代特征的城镇逐步形成,市民社会日益扩大。这种新的社会因素,以“恶”的形式瓦解着宗法封建社会母体和宗法伦理秩序,成为自发产生与传统伦理相冲突的新思想观念、价值标准和行为方式的历史前提。受现实生活中新经济因素的刺激,民风士习也发生明显变化。在明初,“风尚淳朴,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食器皿不敢奢侈。若小民咸以茅为屋,裾布荆钗而已。即中产之家,前房必土墙茅盖,后房始用砖瓦,恐官府见之以为殷富也。”正德、嘉靖间,世风渐趋腐靡。万历之后,“贫民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焉”(《震泽县志》卷二五)。切近市民社会的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态度、思想道德、价值取向变化更甚。我们翻一翻谢肇淛的《五杂俎》、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张岱的《陶庵梦忆》、袁宏道的《袁中郎随笔》等,就不难看出,当时的士大夫已不再安于昔日的斯文雅趣,而甘愿醉卧于风月场中;不再安于簞食瓢饮的孔颜之乐,而一味追求放情恣欲的感官快乐;不再怀幽兰孤芳之操,而宁与达官巨贾合欢于官场市井。一句话,他们不再以忧乐天下为己任,而一味沉溺于讲美食、嗜茶酒、建园林、赏花草、蓄声伎、听评话、读闲书、嬉交游等世俗之乐。人心流于佚荡,生活失之放纵,成为明中后期士人生活的基本征象。标榜“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儒家名教和“存理灭欲”的程朱教条再也收束不住日趋世俗化的士子骚动的心灵。至此,如何回应市民社会和切近市民社会的士大夫对自由主体

精神的追求,如何化解潜滋暗长的社会矛盾,挽救明王朝世运潜移的政治危机,成为社会现实向当时理学提出的内在要求和时代主题。应该指出,从王阳明到刘宗周的心学思潮正是围绕着这一主题而展开和深化其心学内涵的。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长期居于官学地位的正统理学已无力挽救上述危机。在朱子学庞大的理论体系中,内在地包含有三个方面的弱点:一是把“理”绝对化。“理”作为“形而上之道”,是万物“所以然”之故,又是人伦“所当然”之则,在朱子学中占据着绝对至上的地位。尽管朱子讲“性即理”,然而在他的学说中,“理”终究是超越有限之上的绝对精神实体,是天地万物必须遵循的准则(太极)。这就是说,理学本身就包含有压抑个性,以绝对精神(天理)宰制个体精神(人心)的倾向;二是向外穷理的致知论。朱子强调即物穷理,居敬明理,讲“泛观博览”,读书明理,讲致知与涵养并重,知与行相须等,虽然比陆九渊发明本心的“易简”工夫较为合理,但他“物”格于彼、“知”尽于此,穷理于外、诚意于内的致思方法,却包含着尔后王阳明一再批评的“析心与理为二”,“析知与行为二”的支离决裂的毛病,易使学者偏执于“穷理”一途,单在学问思辨上用功,陷入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相脱节的教条主义。三是“学问须严密理会,铢分毫析”(《朱子语类》卷八)的学究气、书卷气。朱子为人近伊川而不似明道,他一生治学严谨,精于名理,长于经解注疏,而缺少陆象山的狂者胸次和王阳明的真性情。他将毕生精力投注于经义传疏,在形上形下,理气先后,道器本末、体用动静、理一分殊、未发已发、致知涵养、穷理践实、心统性情、道心人心、天理人欲等问题上极尽慎思明辨之能事。他所建构的思辨体系,对于少数有学问兴趣的人和那些热心科考的士子来说,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而对大众层面的人和那些具有独特生命体验的人并不亲切。二百余年的官学地位,形式上扩大了朱子学的影响,而实际上却扼杀了朱子学和朱子学派的生命力。元、明之际,朱子之后虽有几个后劲,但论其大观,门户之见日深,墨守之习日固,越来越趋于僵化、封闭、保守和虚伪。理论与实际日益脱节,的正统理学遂被阳明子讥为“口耳之学”。

明代中叶,一批具有自由精神和真性情的文人士子纷纷起来批评理学迂阔、陈腐、虚伪和不近人情。思想文化界遂形成两股批判反省、推陈出新的思潮:一是文学上的,即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文学复古思潮。他们在文学上批判平庸萎弱的台阁体和尊理抑情的理学滥调,主张复兴汉唐诗文情理交融的文学传统。名为复古,实则革新。一是学术上的,即王阳明发起的以“心学”改造正统理学,以心性主体论哲学改造朱子学以“形上”统摄“形下”、以“天理”宰制“人

心”的绝对伦理主义的道学革新运动。两者对于中晚明思想解放均产生了重大影响。董其昌说：“成、弘间，师无异道，士无异学。程朱之书，立于掌故，称大一统，而修辞之家，墨守欧、曾，平平尔。时文之变而师古也，自北地（即李梦阳）始；理学之变而师心也，自东越（即王守仁）始。”（《合刻罗文庄公集序》，《容台文集》卷一）明中后期的社会现实正酝酿着封建文化内部的自我批判。“嘉靖之后，从王氏而诋朱子者接踵于人间”。（《朱子晚年定论》，《日知录》卷十八）

为什么王学能取得这种成功呢？原因在于王学有着与朱子学截然不同的风格，“心学”比“理学”更能满足当时突出主体精神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需要。

王阳明扬弃了朱子学以“理”为形上观念，以外在必然性（理）宰制主体性（心）的绝对理念论，将形而上的“天理”内化为主体性的“人心”，建立起了以“良知”为本，以“心外无理”为第一原理的心性主体论哲学。翻开阳明文集，特别是他的《传习录》，不难看出阳明子不厌其烦地确立主体精神（心、良知、良心、本心）的绝对地位，否弃绝对伦理原则（天理）至上性的努力。他指出：“圣人之学，心学也。”（《象山文集序》）“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传习录中》）“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传习录下》）他针对朱子学向外求理，册子上考索的“支离烦屑”，一再警省门人：“德有本而学有要，不以其本而泛焉以从事，高之而虚无，卑之而支离，终亦流荡失宗，劳而无得。是故君子之学，唯求得其心。虽至于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紫阳书院序》）这里，主体精神（心）不再是形上“天理”的附属物，上升为安身立命的根据，判断是非的准衡，生命之旅的指南。“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传习录中》）“心外无理”的命题内在地包含着反外在权威、贵独立思考的自由精神。

在工夫论上，王阳明针对正统理学向外穷理的致知论和知先行后说所造成的“析心与理为二”，“析知与行为二”的弊病，提出“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的工夫论，突出了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原则。将外在天理置换为人心，只是阳明道学革新的初步，仅停留在这一步，尚不能将王学与陆学区别开来。王阳明道学革新的实质在于提出“致良知”与“知行合一”论，进一步确立了主体道德意志自由原则。“心”是王学的形式，以良心本心统摄知行，方是王学的实质内涵，也是其改造正统理学的主要突破点。

确立道德理想人格是宋明理学的共同任务。不过在如何成德立人的工夫论

上,理学与心学走着不同的路。朱子从形上“天理”的绝对至上性出发,强调通过格物致知,居敬省察等渐修的途径,逐步达到对至上“天理”的认同,从而获得“止于至善”的内圣人格。这是一条向外格物以启发内心觉悟,并以内心觉悟(知)指导外在道德实践(行)的成德之路。问题在于,如果不确立道德自由原则,外在天理与内在人心,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之间就缺少相互转换的根据。这是朱子学面临的理论难题。对此陆象山已有所察觉,他批评朱子“见道不明”,讥讽朱子学为“支离事业”,指出:“晦翁之学自谓一贯,但其见道不明,终不足以一贯”(《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为救朱子之失,象山提出“心即理”,主张“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然而,陆象山并未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因为他的心理合一论建立在唯意志论和唯我论基础之上,是一种抽象的直接同一性(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过于夸大“本心”的主观意志力,而对被本心所涵化的普遍之理照察不足。此正是王阳明批评陆学语有未精之所在。

王阳明超迈朱陆之处,就在于他将“天理”与“人心”有机地统一起来,提出了良知论的道德主体论和“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工夫论。他批评朱子向外求理的格物致知论“未免已启学者析心与理为二之弊”(《答顾东桥书》)。为将心与理统一起来,王阳明诉诸先验的道德理性即良知本体。他指出:“良知者,心之本体。”“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传习录中》)良知作为自心与天理的统一,为道德主体提供了内在的权衡:“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传习录下》)可以看出,作为成圣根据的“心之本体”是普遍伦理原则(“孝”、“弟”、“忠”)与个体性道德情感(真诚恻怛)、道德意识(知善知恶)和道德意志(为善去恶)的统一。至此,在朱子那里无计度、无造作能力,只能搭于气而行的超验天理,不再停留在与形下世界相隔膜的“净洁空阔的世界”(《朱子语类》卷一),具体化为内在于人的血肉之躯中的道德意识、道德情感与道德意志。服从天理不再具有外在强制性(他律),而成为道德主体意识自觉和情感自愿即意志自由的选择。服从普遍的伦理原则即服从自己的自由意志。至此,道德可能性的问题和成圣的内在根据得到了圆通的解决。

道德意志自由原则的确立,为王阳明改造朱子向外求理的致知论,打通心与理、知与行的关系,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从良知本心论出发,他将朱子由外启内的格物致知论,改造为由内正外的致知格物论。突出了道德行为的主体能动性。

他说：“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答顾东桥》）道德实践不再是迫于外在天理的合目的性行为，而成为真正意志自由的主体行为。知行关系也是一样，按照王阳明的“良知”论，良知之所谓“良”，就在于它是一种内在地包含有行动意力的“真知”，而真知必能行，“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上》）“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传习录中》）有时为了强调道德实践的自觉性，王阳明喜欢把话头说到十二分：“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即便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

阳明子以良知本体为“大头脑”和“天植灵根”的工夫论，即不同于朱子以外在天理宰制人心的他律论，也有别于陆象山“自作主宰”的意志论。它将普遍伦理原则与个体心理情感有机统一起来，确立了道德自觉自愿即意志自由的原则，它化解了正统理学中“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普遍伦理原则与个体心理原则的内在紧张。这对于化解明中叶的社会矛盾，以儒家价值收束、整治当时日趋颓靡的风习士气，挽救道学危机，发挥了正统理学所不具备的功能。

最后，在布道教法和施授对象上使儒学通俗化、大众化，将倾心于“危微精一”、理气上下等思辨哲理的正统理学，改造为切近大众生活的“百姓日用之学”，是王阳明道学革新的又一内容。对道学大众化、通俗化的改革，王阳明做出了十分成功的尝试。他打破了道学领域中的精英垄断，不仅为士绅举子讲学，而且开始面对下层大众传授心法。王阳明布道教法与程朱理学风格迥异。他反对板着面孔学圣人模样与人讲学，批评弟子钱德洪和王畿说：“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个愚夫愚妇与人讲学。”（《传习录下》）分明放下了精神贵族的架子。王阳明常用大众化语体——格言、语录、浅近诗歌启发听众的良知，或用对话、交谈的方法传授心学要领。且看他的《咏良知四首示诸生》是多么天机活泼，发人深省：“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这些话虽愚夫愚妇一听便懂，且可终生不忘。阳明心学的大众化，固然有使下层百姓接受儒家正统价值观，以“大传统”同化“小传统”的

一面,但同时也为儒家民本主义走向近代平民意识提供了普泛的哲学文化基础和方法途径。

在某种意义上,可将王阳明道学革新比作西方马丁·路德的宗教革新。王学将超越的“天理”还原为内在的人心,犹如马丁·路德将彼岸的神学还原为此岸的人学;王学的“良知”自律明心成圣,类似路德倡导的“因信称义”信仰得救;王阳明发起道学平民化运动,犹如路德发起宗教世俗化运动。一句话,阳明“心学”精神在中国儒学史上的地位、影响,恰似路德新教精神在西方宗教史上的地位、影响。如果说马丁·路德宗教革新把人从外在宗教权威下解放出来(人可以直接和上帝对话),又把宗教信仰化为人人的“内在世界”,那么,阳明道学革新则通过突出人的道德主体性和意志自由,把外在天理(即普遍伦理原则)内化为人的道德情感和良知自律。这才是王学的真面目。

“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是王阳明用以概括自己心学体系的四句教言,易记易省,言简意赅,心学之体用动静圆通,本体与工夫融洽,最能表达阳明心学宗旨与精神。陈媛媛《儒学道德论:王阳明心学之道德主体性研究》一书,以阳明“四句教”为中心,深入系统地阐述了阳明心学的论学背景、精神特质、内在理路和历史地位。该书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主题新颖,结构完整,文字流畅,资料翔实,能够在认真研读文献并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陈媛媛博士攻读学位期间,尊敬师长,勤奋好学,学位论文答辩时老师们在肯定其学术价值的同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修改意见,本书多有吸收采纳。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作为导师深感欣慰,谨致祝贺并乐观其成!愿媛媛同学能够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写出更好的学术作品。

是为序。

李振纲

2015年10月6日

(作者为河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目 录

CONTENTS

第1章 绪 论	1
1.1 问题的提出	1
1.2 研究意义	4
1.2.1 理论价值	4
1.2.2 实践意义	5
1.3 阳明心学的研究现状述评	5
1.4 研究方法、主要内容与创新点	8
1.4.1 研究方法	8
1.4.2 基本思路	8
1.4.3 结构安排和主要内容	9
1.4.4 创新点	10
第2章 道德主体性思想产生的历史前提与发生契机	11
2.1 道德主体性的概念界定	11
2.2 历史前提与发生契机	18
2.2.1 社会政治背景	19
2.2.2 社会经济背景	23
2.2.3 理学文化背景	24
第3章 身之主宰便是心	49
3.1 身心观	49

3.2 心之体“无善无恶”释义	55
3.2.1 从存在论角度释心体之“无善无恶”	55
3.2.2 从本体论角度释心体之“无善无恶”	57
3.2.3 从境界论角度释心体之“无善无恶”	60
3.3 无善无恶之争	64
3.4 善恶的来源考证	66
3.4.1 人性论上善恶观的来源	66
3.4.2 形下层面善恶的来源	70
3.5 道德主体性的形上学基础	75
3.5.1 心即理	75
3.5.2 心与性	83
3.5.3 一元论的体用观	87
第4章 心之所发便是意——道德主体性的发动	91
4.1 “意”之独特功能与核心地位探讨	91
4.2 未发已发论	94
4.2.1 未发已发关系探讨	94
4.2.2 中和状态辨析	95
4.2.3 “未发之中”、“已发之和”是一种境界	98
4.2.4 致中和之方	99
4.3 理欲观	100
4.4 仁诚说	106
第5章 意之本体便是知	112
5.1 “知”范畴论	112
5.2 良知说	118
5.2.1 良知之特性辨析	119
5.2.2 良知与见闻之知关系辨析	129
5.2.3 群己之辨	133
5.3 致良知	137
5.3.1 致良知释义	137

5.3.2 致良知与德性培养过程的统一 139

5.3.3 “为善去恶”工夫论 142

第6章 意之所在便是物 145

6.1 “致知格物”观的确立 145

6.2 心外无物 154

6.3 主体性的道德实践哲学 161

6.3.1 阳明对佛道墨诸家思想的取舍与评价 161

6.3.2 知行学说 170

6.3.3 道德修养之最终归宿与目的——成己成圣 186

6.3.4 树德之方 189

第7章 道德主体性思想的定格及其历史余响 197

7.1 道德主体性思想的凝练与定格——四句教 197

7.1.1 时间考证 197

7.1.2 天泉之争 199

7.1.3 刘蕺山别立“四句教” 203

7.1.4 对四句教的评价 205

7.2 阳明道德主体性思想对晚明士人心态的塑造及其流变 208

7.3 道德主体性思想的当代价值 214

结 语 233

参考文献 234

后 记 239

第1章

绪论

1.1 问题的提出

作为对传统儒学的变革,“理学”是宋明时期一种特定的阶段性哲学思维形态,在这一总体框架下,出现了各具特点和不同倾向的派系,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理学分派有两派、三派或者多派之分的说法。两派之分主要是以程朱为代表的道学和以陆王为代表的道学。三派分就是上面两派的基础上,加了以张载、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等为代表的气学一派。另外,还有学者提出了“性学、道学、心学、气学”四系说。其分派依据搁且不论,“心学”作为理学一大流派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心学的重要代表人物阳明,是在古代被称为“真三不朽”的人物,三方面成就都非常圆满,其本人及其学派的思想传播域外,对国内外都产生的深远影响。自明代中叶之后,王阳明心学就是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思潮,本课题拟就心学一派之核心人物王阳明的学说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的道德主体性思想做一深入解读。

之所以研究心学之道德主体性,首先是因为心性问题的探讨密切相关。儒家自创始人孔子起,后经孟子历陆九渊乃至阳明,始终都把心性问题的摆在道德修养的首要地位。孔子在谈到“孝”时,说道:“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①可见内心存敬与否是判别人与动物的关键,也是人之为人的道德要求;孟子将仁义礼智说成心之“四端”,并且将“求其放心”作为人之为学的途经和

^①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10月版,第56页。

目的;陆九渊更是创立了独特心学,将心性发展到极致;阳明承接陆九渊,提出了著名的良知说、致良知、心即理、知行合一等理论观点。儒家心性论无一例外其指向都是“道德”这一根本性伦理问题。宋明时期理学高度关注心性关系,加之理学辨析心性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决内圣之境何以可能的问题,因而理学被称为心性之学。不同的是,在道德义路的开创上,程朱所开的是“道问学”的外在义路,而陆王一派的拓展方向是“尊德性”的内圣践履义路。此路径由陆九渊开启,为阳明所承接发展,并最终定格为王门“四句教”法,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儒家思想中道德主体性的精神内涵是比较突出的,尤其是在心学一派王阳明的思想中,其学说蕴涵着丰富的主体性意蕴,值得我们去反思和挖掘。马克思说:“人始终是主体”。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其主体性首先表现为道德主体性。阳明提倡道德修养,认为自我即是道德的主宰者,强调在道德行为选择上的自由自主性。

道德主体性是认识论产生以后历代哲人所关注的重要哲学问题,关于自我的个体性意识,早在先秦就已露端倪:孔子提出“为仁由己”,孟子在道德实践问题上主张人贵自知自觉,杨朱提倡“为我”,“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杨朱的“为我”强调的就是个体性。到了陆王,主体性问题较为凸显,陆九渊高扬个体的意志,在其后学中,个体性受到了更多关注,他的弟子杨简由强调个体性进一步向唯我论发展,将自我视为第一原理。元代的吴澄过分突出自我的地位,肯定道物皆存在于心,认为自我之心同时就是万物的主宰;在历史上,董仲舒的道德纲常说以及程朱将道德的合法性放置于外在天理的做法,都极大地扼杀了个人的独立性价值,人们在神圣化、程式化的道德说教下,个体的主动性受到了空前压制,《明史》记载了当时的真实境况,朱元璋正式下诏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后,“人之所言者,以求诸语录”的教条之风大为盛行。阳明作为道德哲学家,认为道德并非来自于外界,“向善”是人先天本具的潜能,他承接起孟子的“良知良能”说,高扬良知自由,张扬人的道德主体性,主张人人皆可成。在当时的背景下,阳明道德主体性思想的提出,就既是对历史上曾重视个体能动性和自我价值的火花的承袭,又是对程朱理学笼罩下压制个体自我的抗议。

该论文从“道德主体性”这一视角来透视阳明心学,力求认真梳理解读并深入挖掘其中的道德主体性价值,朗现人性本具的崇高道德之境。所谓“性相近,习相

远”^①皆由心之堕落引起,不可否认,曾经对我们的文明起到奠基作用的美德在现代人心已经很大程度上消失了,在道德良莠不齐的今天,重塑心境,重提良知之学,重建人的道德主体性,对于“善”的回归、对于唤起对美德的尊敬无疑具有时代意义。当今社会,物质资料极大丰富,但物质欲望的满足是不是人生追求的全部价值呢?除了物质生活,显然生命主体需要有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由此看来,阳明的“良知”学说仍有其独特价值。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无疑,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推进道德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途径。2015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讨论中对王阳明的历史作用给予高度肯定,认为“王阳明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王阳明(1473—1520)生活在东西方互相碰撞交融的时代,习总书记讲王阳明是要我们自觉去面对东西方交汇融合的大历史,并深入思考在这样的大历史中,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怎样行动,这是习主席反复提王阳明的意向所在。当前我们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阶段,常言道:“变制度易、变人心难”,“治事容易治心难”,“制度的改革”与“人心改造”是两个不同的过程,王阳明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于一身,历史上他从改造思想和人心的角度来思考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创新问题。今天我们仍需秉承王阳明先生的教导,以一颗光明的“心”将心思凝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上,去思忖改革的大局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王阳明心学从字面上看似只是研究思想之学,实则是经世致用之学,是一场以救世为宗旨而倡导的思想改造运动,预示着一个启蒙时代的来临。其从本体论、伦理学、认识论等多个角度分析探讨了心性之辨、心物关系、知行、本体与功夫论、良知及致良知等问题,提出了诸多修身治世的良方,值得我们挖掘和借鉴。本文尝试对其中的道德境界及修养工夫做一较为全面的诠释,希望这一工作可以为阳明心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并为拯救道德危机、社会危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传统文化资源。

①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10月版,第175页。

1.2 研究意义

道德主体性,是认识论产生以后历代哲人所关注的重要哲学问题。关于自我的个体性意识,早在先秦杨朱时就已露端倪,“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①。杨朱的“为我”强调的就是个体性。到了陆王,主体性问题较为凸显,陆九渊高扬个体的意志,“人之于耳,要听即听,不要听即否,于目亦然,何独于心而不由我乎?”^②在陆九渊的后学中,个体性受到了更多关注,其弟子杨简由强调个体性进一步向唯我论发展,将自我视为第一原理,元代的吴澄过分突出自我的地位,肯定道物皆存在于心,认为自我之心同时就是万物的主宰。阳明作为道德哲学家,承接了孟子,认为道德并非来自于外界,“向善”是人先天本具的潜能,他高扬良知自由,张扬人的道德主体性,主张人人皆可成圣,这些思想对于构建当世伦理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主体性学说也是关于人的学说,人本理念自古就是我国所坚持和弘扬的理念,阳明的道德主体性学说反映了对人性问题的关注、对美好境界的追求以及对理性自由的崇尚,由于主体性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开放范畴,主体性的发挥受到个体及外界环境多重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在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和作用的同时,进一步发掘主体性思想的可发挥价值,为道德和社会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

另,任何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王学兴起于特殊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之下,本文力求深入解读心学,还原明朝社会风貌,进一步发掘其历史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本文对于阳明道德主体性思想的研究,既有对历史的尊重与还原,又有对当今社会的正视与反思,力求在古今对比中为当今社会、个人道德的重塑以及文化传承找到可靠的支撑力。

1.2.1 理论价值

由于专门研究阳明心学道德主体性思想的文献尚不多见,本文对其做一个较

①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10月版,第357页。

② [宋]陆九渊:《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1月版,第439页。